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3.01.011

非洲文学国族想象的话语困境与批评重构

胡 美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 长期以来, 相比于处于主流与中心位置的西方文学, 非洲文学无论创作还是批评都处于边缘的位置, 其边缘身份源自西方他者的操控及非洲文学主体性的迷失, 但不可忽视的是, 在现代非洲社会文化转型进程中, 非洲作家在自塑非洲形象时, 一直试图将民族国家文化的本土化嵌入现代性的结构中, 以获取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双重视域; 从他塑到自塑, 体现出非洲文学超越西方话语制导的理论自觉。在廓清非洲文学“殖民内置”与“自我东方主义”的基础上, 非洲文学批评应植入“对位批评”的话语形态, 为重构非洲文学现代传统及自主批评体系夯实基础。

关键词: 非洲文学批评; 非洲文学; 殖民内置; 自我东方主义; 对位批评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3)01-0087-07

引用格式: 胡 美. 非洲文学国族想象的话语困境与批评重构[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8(1): 87-93.

Discourse Dilemmas and Cultural Reflections of National Imagination in African Literature

HU M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compared with western literature which is in the mainstream and central position, African literature is in a marginal position in terms of creation and criticism. Its marginal identity stems from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western others and the loss of the subjectivity of African literature. However, it cannot be ignore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Africa, African writers have been trying to embed the localiz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into the structure of modernity when shaping the image of Africa. In order to obtain the dual vision of nationality and modernity; From “he shaping” to “self shaping”, it reflects 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African literature beyond the guidance of western discourse.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lonial built-in” and “self orientalism” of African literature, Af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should be implanted into the discourse form of “contrapuntal criticism”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reconstructing the modern tradition of Af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system of independent criticism.

Keywords: Af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African literature; colonial built-in; self orientalism; Contrapuntal criticism

收稿日期: 2022-07-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非洲疾病演进与防控史研究”(17BSS012)

作者简介: 胡 美(1979—), 女, 湖南湘潭人,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为非洲文学与非洲史。

从世界文学的框架来整体凝视非洲文学创作及非洲文学批评,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非洲文学创作者还是评论者,往往都长期受制于西方“他塑”话语控驭的尴尬境地,进而影响其本土文化的发声与传播,因此其自我意识和“自塑”的主体性功能都亟待进一步强化。如何打破“他塑”的偏狭,走出非洲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自塑”困境,是不容忽视并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学界亟需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立足非洲本土文化立场,在融通世界现代文化的普世性和特殊性的价值天平中考量非洲文学批评的文化走向,建立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模式即“对位批评”,从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抗转向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在文化宽容的总体心态下采用“非对抗性”的批评策略,以拓宽非洲文学和创作的学术发展空间。

一、“想象共同体”与非洲文学的国家认同

在世界格局中,能够区分和限定人的身份的重要方式就是其所从属的民族或国家。相同的民族和共同的国家具有较为相近的文化性格和取向,这使得一个民族或国家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排他性也随之而生。民族和国家的特性最终要依赖国民的行动态势、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等群体性的“原动力”来予以确证。事实上,民族国家的构成,不仅表现在通过实在的组织来维系其完整形态,规训其行为秩序,而且其还通过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和控制着内部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正因为民族和国家的这种非实体性的构成,它的存在也就必然要以某种虚构性的文化来表达。这样一来,文学就成为了想象民族或国家的重要载体。文学本身的属性和审美特性对于想象民族国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它能摆脱物理钟表刻度的限制,借助文学的叙事与抒情来表现民族或国家的社会经验和历史印记。更具体来说,民族国家的生成或分合都能在文学中找到可应证之处,尤其是那些具有巨大社会影响的政治历史事件,往往能在现实主义思潮中得以展现。然而,文学的反映和再现现实的功能毕竟不能取代或等同于现实,因而文学想象民族国家的作用被凸显。对于这一点,安德森将现代民族国家视为“想象

共同体”,文学的价值功用体现在用“民族语言阅读”来塑造“现代民族国家”上^[1]。也就是说,文学绝非游离于民族或国家之外的真空存在,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中,文学构筑的意识形态命题反映了时代命题,并借助宏大叙事而参与社会历史的进程。

非洲作家自然不会盲视这种基于民族国家而开启的现代性想象传统,在其文学创作中,“民族”“国家”“国民”等议题俯拾皆是,而期冀非洲摆脱落后、封闭等“前文明”状态的文学叙事更是不胜枚举。比如,非洲作家赛泽尔的作品融合超现实主义和传统文化,挖掘殖民地人民潜意识中的身份认同危机和思乡情结,也由此暴露出殖民主义的虚假和伪善。在《返乡笔记》中,他这样写道:“我的黑性不是一块石砾/不是对白日的喧嚣充耳不闻/我的黑性不是一片漂流在死水上的白肉/不是地球一只瞎盲的眼/我的黑性不是高塔也不是教堂/它插进馊水中鲜红的肉屑/它刺入天空中火红的气体/我的黑性以洞穴作谜底/它来自尊贵的坚忍所生的极度苦楚。”^[2]在这里,非洲人的命运沉浮在诗人深沉的描摹中被凸显出来,而其中非洲人的精神品格也被抽象地概括为一种“黑人品性”;这种根植于自己本土文化血脉而生成的民族精神孕育于非洲弃旧立新的进程之中。同时,赛泽尔对殖民主义的警惕和批判也构成其文学创作的重要内涵。对于“帝国烧掠”“白人性暴”等历史事件,他没有保持缄默,而是主张唤醒沉睡的非洲人,打破其沉睡的状态,用其苦难的身体支撑拯救非洲的时代使命:“我们要用戴盔甲的头颅击打新鲜空气/我们要用狠狠张开的手掌击打太阳/我们要用光着脚的嗓音击打土壤/雄性花朵会睡在镜子的缝隙甚至三叶虫的盔甲里/会在永恒的半明半暗中降低自己/在那些膨胀着牛奶矿的柔软胸膛上/难道我们不要进入那门廊/那毁灭的门廊?”^[3]这种对于非洲民族国家“乌托邦话语”的营构,凸显出非洲本土作家关注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辩证眼光,彰显了非洲作家脱逸传统叙述模式,在进步主义的潮流中描写非洲民族国家的形象。对于这种想象,有学者将其描述为“对非洲的执迷”^[4]。这种塑造非洲形象的文学实践充分表明,非洲文学在摆脱了他者操控的前提下反求诸己,这种自塑的文学实践能更好地避免他塑

所带来的理论偏误，其在“以非洲为方法”的理念指引下，重建了非洲文学的知识观和现代文学传统。

非洲现代化后发的特性，使得非洲作家无法排拒文化心理上的焦虑与痛苦，现代与传统的复杂关系在其文本中多有表征。由于西方和传统双重他者的存在，非洲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发展是非洲文学亟需正视的理论畛域。现代化的召唤渗透于非洲文学的价值体系之中，也深刻影响了非洲形象的创构。于是，在非洲文学的非洲形象塑造中往往会隐含着新旧转型的意涵，其宏大叙事的惯用手法，体现了非洲文学在冲决殖民主义控制之下开启表述自我主体的现代性价值意涵。在非洲的现代化过程中，在对现代性采取何种回应方式的问题上，后发国家存在着两种流派：一是启蒙主义；二是文化守成主义。前者主要以现代思想为参照，运用启蒙主义的思维来改造旧文化、构建新思想；后者则固守传统性，力图从本土化的基因中找寻符合现代精神的质素。阿契贝属于前者，其代表作《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既隐喻了一个旧的非洲形象的“瓦解”，也预示着新的非洲国民及国家形象的重构。小说以伊博族村落的原始生活为视点，反映了非洲土著人的生存境遇与精神面貌。由于他者（白人的入侵），非洲原始部落的镜像被打破。在这种“刺激—反应”的模式中，阿契贝以西方文明入侵为主线，揭橥了非洲传统文化在现代性危机中的沉浮，其对主人公精神信仰的描摹更是入木三分。从表面看，阿契贝书写了非洲人精神信仰的缺失，对国民弊病进行了鞭挞，但我们应注意到其以鞭挞丑恶的方式来找寻现代性传统的良苦用心。改变非洲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改造国民性，只有经由痛苦的“凤凰涅槃”，才能实现非洲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在这里，以阿契贝为代表的非洲作家并非简单认同西方对非洲国民性话语中的“本质化”看法，而是以西方他者为镜来烛照非洲、开启民智。在本书中，主人公奥贡喀沃是一个类似于古希腊悲剧主义者的形象，作家将其命运置于非洲民族国家历史变迁的情境下。他的抗争是个体性的，并且最终归于失败，但作者对这种个体抗争失败的反思显然也能折射当时非洲社会和文化的整体面貌。显然，非洲式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不是作家

人为想象出来的，而是非洲民族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自然显露，其中集结着新旧转换过程中知识、思想和信仰变动的讯息，这也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经历。

从元概念看，国民性包含了如下意涵：一是作为整体性的精神特质；二是作为个体性的国民特性。无论是整体性的精神特质还是个体性的国民特性都体现了“人”的精神状态，因此也就体现了“文学”作为“人学”的结构特征。国民性可以理解为民族性或国民品格，它是一个国家的国民身上比较稳定、恒久的精神品格。在西方他者的参照下，很多非洲作家将国民性视为非洲传统的所指，在他们的意识中，国民性是与劣根性等量齐观的。这显然是一种将国民性本质化的“自我东方主义”。埃及的纳吉布·马哈富兹、尼日利亚的沃莱·索因卡、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和 J.M. 库切等非洲作家之所以能够营构具有很大影响力的非洲形象，其根本原因是他们统合了“人的现代化”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的关系，将“立人”与“立国”有效结合起来。这种立场打破了“唯西方”的标准，其所描述的非洲问题最终落脚于非洲的自由与民主。“现代性焦虑”引出了非洲知识分子对于国民性问题的关注，先觉者面对非洲积贫积弱的局面，在超越了早期对器物、制度的过多关注后，将视野转向国民的素质即国民性。于是，先觉者笔下这些尚不具备自省意识的老非洲人身上，集中寄托了詹姆逊所谓“寓言式的共振”^[5]，即借助于对其精神和灵魂的批判和反思来聚焦第三世界国家对于未来的想象。

二、“他塑”的偏狭与非洲文学批评的“自塑”困境

一般而论，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聚焦形象本身，二是要有他者的透视。前者是根本，后者是必要条件。对于非洲文学来说，首先要表征“非洲”的形象特质，但这还不够，还需包含“自我”与“他者”的参照及相互作用。“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6]非洲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西方他者与非洲本体之间存在着顺应及反抗的话语结构，这深刻地影响了非洲文学的非洲形象塑造。文学形象

主要以异国形象为主,这种形象塑造背后往往隐伏着言说者自我主体的精神折射。在西方思想界,为了适应西方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经由作家的过滤、选择和内化,作为“他者”的非洲形象几经变化,成为其意识形态整合的想象体,非洲形象可以视为西方他者对非洲本体的想象与重述。在这一话语交流的过程中,“想象往往比知识更重要”,“想象的力量足以创造或超越现实”^[7]。由于非洲“后发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有较大的差异,这种不对位的参照又衍发了非洲民族主义的基调。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促使非洲作家转换西方他塑的误读,转向以自塑的方式来重建非洲形象,这种“自塑”显然体现了自己言说自己的主体性。

对于非洲的想象而言,西方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他塑”的误读。非洲形象在西方作家笔下往往是一个阴性的存在,既妖娆美丽,又贫穷愚昧。对于类似于西方“他塑”非洲形象的行为,学界提出了如下质疑:自我与他者的界限究竟如何划定才是合适的?谁来界定“合适”的边界?自我与他者之间是否存在着调适和融通的可能?换言之,塑造国家形象有内外两种路径,这其中既是作家个人行为的结果,又含有意识形态介入的可能,如何将两种途径互为主体来统筹观照,对于理解和塑造国家形象意义重大。对于这种有别于自塑非洲本土文化的他塑行为,非洲知识界保持着一种较为理智的清醒。他们不屈从于他者的话语控制,而是从自身文化的立场出发去审思自我与他者,由此建构起具有非洲本土文化特质的文学批评资源与体系。不言而喻,西方作家在描述非洲的过程中存在着“美化”和“丑化”两种不同的误读倾向。就前者而言,美化固然能激起一些非洲读者对于本土文化的好感和认同,但如果看不到这种美化背后所隐含的对于“乐观的爱国者”的危害,势必会强化、固化非洲读者的短视,这正如鲁迅先生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所言: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要愈深的。非洲显然也可作如是观。对于“丑化”非洲的“误读”,我们也应既看到其能激发非洲国民奋起改变现状的刺激功能,同时也要警惕其以一种强势的西方国家范式来约束和压制非洲国家发展的后殖民统治趋势。齐诺瓦·阿契贝(chiIlua

Achebe)的文学批评主要体现在他著名的《非洲的一种形象:论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这篇论文中。阿契贝对英国文学经典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和分析。针对康拉德歧视非洲和非洲黑人的现象,以及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价值标尺对非洲形象的丑化,阿契贝予以了尖锐的批判,他也由此获取了非洲文学批评界的高度关注。阿契贝的文学批评绕开了“唯西方”的批评立场,其深植于非洲民族主义的文化土壤的批评方法,为此后的非洲文学批评提供了重要参照。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在创作早期非洲题材小说《野草在歌唱》《暴力的孩子们》《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后,曾经备受争议。在其作品中,莱辛明确显示了自己的反殖民立场和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及实践的主观尝试。对具有非洲本土文化认同感的文学批评家而言,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固然是被叙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丧失了自我陈述的可能与空间,他们对于莱辛等人的文学书写并不认同,从“现代与原始”“城市与乡村”的理论框架出发,他们从这些作品中发掘出殖民主义的话语裂隙;有的批评家则站在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观照非洲被殖民主义奴役的“边缘”身份及角色定位,试图从“文化多样性”中找寻一种类似于霍米·巴巴所谓的基于“文化差异”而引出的“文化互动”思维模式^[8]。

在上述他塑的话语视界中,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与非洲本土作家的“自塑”不同,西方作家的他塑往往将非洲视为一个言说自我的镜像,从而导致非洲形象以一种“在而缺席”的方式存在于西方话语的场域中,并最终绕开了对非洲本土文化的真正关切与观照。无论西方作家书写非洲的动机如何,这种关于非洲的描绘依然遵循着“东方主义”的话语逻辑:以西方价值体系为标尺,非洲缺乏西方那种“历史本质”和“主体性”,这反而确证了西方自己的本质和主体性。与此同时,对于非洲文学界来说,西方他者的介入也打破了非洲中心主义的固化思维,从而在启蒙主义的驱动下促发非洲人破旧立新,从“传统”走向“现代”。在相互参照的系统中,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和局限性并存,成为非洲文学塑造自我形象的知识背景,由此也衍生了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悖论:

非洲本土知识分子是接受了现代性烛光照耀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否能够代表非洲的“本土性”和“主体性”。换言之，“本土性”和“主体性”究竟是静止的、封闭的，还是流动的、变化发展的？究竟是作为“发现”的“本土性”和“自主性”，还是作为“发明”的“本土性”和“自主性”？“自塑”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可能？这显然使得非洲文学批评深陷借他人话语来反他人的逻辑怪圈之中。于是，非洲作家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的现代话语，也默许了西方对于非洲形象的价值认定，另一方面又因无法排拒西方话语而引起强烈的本土焦虑。概而言之，在自我与他者相互参照的框架中，非洲文学的国家形象塑造存在着明晰的“他塑”现象，这显然是西方现代话语与陈旧的非洲传统价值观念合谋的结果。在西方话语的统御下，非洲不是一个主体，而是被曲解的“无声”的、“前文明”的他者。非洲形象的沉默和边缘化是西方话语殖民的产物，也在很大程度上将非洲形象定型化，从而成为一种套话进入了非洲文学批评的价值系统，这极大地贬抑了非洲形象固有的精神质地，并阻滞了非洲文学自塑非洲形象的进程。

总之，在此情境下，如果离弃了非洲文学所置身的殖民语境，盲视其以鞭挞国民性的方式来驱动非洲新民以及新国的创生事实，视其为“自我东方主义”^[9]，明显是不公允的。显然，非洲作家对于非洲国民性的批判体现了其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这种努力并非其受殖民话语诱引而致，也未迎合西方对于非洲的“他者”想象，其是基于一种描写弱者反抗的非洲本土立场而为。

三、“对位批评”与非洲本土文学话语的绽出

如上所述，非洲文学批评中存在着盲视批评机制两歧性的问题。非洲文学批评中存在着用西方立场来解读非洲本土文学的“殖民”心态，存在着贬抑非洲文学努力“自塑”形象行为的现象，其忽略了非洲人“自我意识”的生成与对本土文化的观照。这样的文学批评显然是无法真正理解和阐释非洲文学的，因此我们亟需建立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模式。

萨义德提倡的“对位批评”是一种源自于音乐的文化批评模式，其特色和优点在于最大限度地

避免了批评中可能存在的二元对立模式，提倡一种多声部的平等对位和对话^[10]。殖民主义暴力在后殖民时代主要表现为经济和文化上的压迫与控制，但是非洲与西方文化间的交流是十分复杂的过程，其间既有对立对抗，更有融合与对话。

对于非洲文学批评家而言，他们的使命在于有效地廓清“他塑”非洲实践中存在的误读现象，为非洲本土文学言说自我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隔与互动现象进行合理阐释。这其中，非洲文学内蕴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并置应引起批评家的高度关注。以南非作家库切(J.M.Coetzee)的小说《耻》为例。《耻》展现了种族隔离政策废除之后“新”南非的生态环境状况。在作品中，非洲本土自然风情充满了异国的神秘性，驱使着读者去进行跨文化的审思。作为读者，如果只沉醉于这种自然性的赞誉语境和氛围之中，而盲视其背后所隐匿的社会文化生态的考察，那么其对《耻》深厚的主题势必会缺乏应有的理解与认知。在美丽的自然景致的另一面，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人类对土地的过度垦殖和对动物的滥杀已经开始隐喻非洲现代化过程中所潜伏的危机。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南非殖民历史和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后果，非洲作家在营构自足文化韵味的非洲自然景致的时候，也增加了一层对社会隐忧的考量，这使得这些文本的内部出现了自然性与社会化的张力关联。这种张力关系不是一方完全吞噬另一方的取代关系，而是构成了一种互为“借镜”的观照网络。作家游刃有余地进出于这组关系的张力关系之间，为读者再现了一幅动态的南非社会文化风尚的转型图景。南非作家穆达的《红色之心》也可作如是观。该著从南非的自然人性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去探究殖民权力的两面性，以此表现作家对于宗主国文化统治的颠覆性认识。

在论及文学现代性时，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指出，“使曾经不存在的东西成为不证自明、仿佛从前就有了的东西一样”是一种话语的颠倒，这就是“风景”的发现。在他的思维里，“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11]。这即是说，如果不能理性认知“风景”的认知装置，就无法真正还原其被颠倒的起源。在现代化的序列中，“非

洲”是一个亟待重新发现的“风景”，它是非洲作家召唤的一个“文化存在”，体现了非洲作家建构文化想象的集体无意识。从这种意义上说，非洲文学的“边缘性”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其最终指向的是非洲作家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主体性层面。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展开如下思考：非洲文学是如何建构起“文学非洲”的？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型塑非洲运用了哪些方法与策略？而这种方法与其他非文学的“型塑”方式有何差异？文学的想象方式如何得到彰显？通过将建构的“非洲”与现实存在中的“非洲”进行观照，非洲作家笔下的非洲“边缘”和“弱者”定位又是如何在其历史叙事及新旧转型的文化语境中被想象性地建构起来的？

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非洲文学“被书写”和“缺席”的状态一度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甚至在很多文学批评家眼中，非洲文学被铭刻上了“第三世界文学”的刻板封印^[12]。因而，祛除其弱者和边缘角色的尴尬，努力在世界文学中找寻自己的立足之地，成为了非洲文学批评界不容忽视的使命。事实上，非洲“弱者”形象的建构是无法绕开西方“强者”的现代性话语经验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一方面，现代性的强势话语意味着与弱者身份告别，两者划定了无法融通的质的规定性，这种断裂势必会拉开现代与传统的距离；另一方面，这种断裂又无法确证现代话语本身的强者身份，也无法界定传统弱者的来源及出处，这种断裂与融合的调适并非现代性话语能予以缝合，因此需要现代与传统的双向发力去补全其各自的价值。然而，现代与传统事先所设定的差异性又无法修复这一困境，这就给非洲文学批评带来了诸多困难。在前述张力结构中，弱者与强者的关系潜入了现代与传统的结构中，现代话语通过挤压传统话语致使传统脱落而丧失自身价值，但由此确立的现代性话语却无法为传统提供合法性条件，而丧失了合法性的传统也无法为后续的现代话语提供资源。这正是现代非洲文学中现代与传统关系的真实状况。对于非洲文学而言，非洲文学的国家形象塑造不能仅依靠斩断传统来获取现代话语权，其需要借助传统的现代性转换来获取合法性条件。一味地与传统告别或切断传统之根，不仅无助于非洲本土化的

重建，反而会助长西方中心主义的气焰。

在当代中国的非洲文学批评中，研究者较为看重非洲作家描绘“非洲形象”的价值定位与书写方法及评估视野，倚重非洲文学自主性的绽出与在场。聂珍钊在全面梳理非洲文学批评的过程中，重申赛泽尔的“黑人品格”。在他看来，这种“黑人品格”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成为非洲文学的伦理——文学通过对黑人品格的描写，确认自己的黑人身份和认同，从伦理上找回自信，建立在黑人品质基础上的伦理选择是基本特点^[13]。事实上，无论是“黑人品格”还是非洲的本土性或民族性，都离不开“非洲质素”的文学书写，但这种非洲形象的书写也不能离弃文学的“审美特性”，否则，其只是离弃文学基本属性而沦为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工具。陈海容的非洲文学研究强调黑人的民族性和本土立场，主张在尊重非洲作家的“自塑”努力的前提下，重视辨析西方作家、批评家带有偏见的文化“他塑”现象。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下，非洲文学一度被认为，其无限度地迎合西方话语而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因此，其弱者身份不但难以改变，反而被烙上了一层鬼魅的西方话语的印记。在此基础上，非洲文学在讲述“非洲故事”的时候也将非洲文化历史的社会进程隐喻出来，这其中，“伦理”与“审美”机制的两歧性导致了非洲文学创作的两难取向。姚峰意识到，非洲作家通过改写和挪用帝国语言等策略达到了对殖民话语的消解和颠覆目的。他认为，沿此逻辑，非洲文学要想真正地言说自我，必须从非洲文化的本体出发，这样才能发出“非洲的声音”，为其身份重建踏出坚实的一步^[14]。事实上，这种自觉既是非洲文学内蕴的精神品格，也是其进一步强大自身的前提。这样一来，现代与传统的区别就不再是物种性范畴中的差异，而是关联着非洲特定社会文化形态的话语之争。由此，一种关于非洲文化与国民的“苦难”叙事就转变为非洲作家对于非洲文化的新一轮的价值重估，也因此促成其从自我的单一叙事转向自我与他者互为参照的双向叙事。这种想象空间唤起“弱性群体”范式性的赋权可能，是弱者向强者拓展话语空间的必然结果。

概而言之，非洲文学中“非洲性”的绽出与

确认在一定意义上预示了非洲文学未来的批评价值取向。赛义德、霍米·巴巴等人对民族主义传统的看法对探索非洲现代化道路和非洲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都具有启发性意义。从学理上说，非洲文学批评不宜再过多地采用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内核的“文化对抗”模式作为主要的价值取向，而应立足于非洲本土文化立场，在融通世界现代文化的普世性和特殊性的价值天平中考量非洲文学批评的文化走向。在文化宽容的总体心态下采用对位批评模式和“混杂”“模拟”“文化翻译”等“非对抗性”批评策略能够拓宽非洲文学批评的学术发展空间。简言之，非洲文学批评应该从对抗走向对话，从二元对立走向“主体间性”。

参考文献：

- [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M]. 吴叡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7.
- [2] CESAIRE A. The Collected Poetry[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49-50.
- [3] IRELE A, IRELE A F. The African Imagination: Literature in Africa & the Black Diaspor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291.
- [4] CARLOS R. The Location of African Culture[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112.
- [5] 詹姆逊. 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 [M]. 张京媛，译. 当代电影，1989(6)：45.
- [6] 巴 柔. 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 [J]. 孟 华，译. 中国比较文学，1998(4)：79.
- [7] 史景迁. 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 [M]. 2 版. 廖世奇，彭小樵，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6-17.
- [8] GOLDBERG D T, QUAYSON A. Relocating Postcolonialism[M].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press, 2002：39.
- [9] 德里克. 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 [M]// 罗 钢，刘向愚.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1.
- [10] 萨义德. 东方学 [M]. 王宇根，译.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9：211.
- [11] 柄谷行人.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M]. 赵京华，译.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6：12.
- [12] DIRLIK A.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J]. Critical Inquiry, 1994, 20(2)：211.
- [13]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 [J]. 外国文学研究，2006，28(2)：8-9.
- [14] 姚 峰. 阿契贝的后殖民思想与非洲文学身份的重构 [J]. 外国文学研究，2011，33(3)：118.

责任编辑：黄声波